

动态经济学

〔英〕罗伊·哈罗德著

商务印书馆

动态经济学

〔英〕罗伊·哈罗德 著

黄范章 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Roy Harrod

ECONOMIC DYNAMICS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动态经济学

〔英〕罗伊·哈罗德 著

黄范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234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8 千

印数 1~7,500 册

印张 $7 \frac{7}{8}$

定价: 0.84 元

评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

黄 范 章

(一)

罗伊·哈罗德是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以创立所谓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而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1973年出版的《动态经济学》一书，乃是他在七十年代系统阐述其理论观点的一部新著。

哈罗德虽然早自三十年代起就追随凯恩斯，却认为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只是一种短期的、静态的（或者说是比较静态的）分析，主张把它加以“长期化”、“动态化”；企图建立一个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为基本内容的所谓“动态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便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年）一书，对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条件。1973年他出版《动态经济学》，则对他在20多年前阐述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并极力宣扬他的“动态理论”是对凯恩斯学说的重大“发展”。他说，凯恩斯虽是一位“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师”，却局限于“静态经济学的领域”而“在宏观动态理论方面留下了空白”。言下之意，正是他的动态经济理论“填补”了这块“空白”。那么，究竟哈罗德给凯恩斯的“理论”作了哪些重要的“补充”呢？

哈罗德的理论，完全建立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但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对凯恩斯的理论作了一些较为重大的“修补”。这主要表现在：（一）在方法上，他把时间因素引进到凯恩斯关于储蓄—投资的分析中来，用按比率（增长率）分析的方法来代替凯恩斯的按水平分析的方法，以论述动态均衡的条件。（二）在理论上，他认为凯恩斯理论的缺陷之一，乃是它只反映了投资对增加产量（收入）的刺激作用（“乘数论”），却忽视了产量（收入）的增长将“引致”投资更迅猛地增长。他从所谓“加速原理”出发，着重强调：投资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产量（收入）变化率的“引致”作用，而不取决于产量（收入）变化的绝对水平。（三）他认为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它只看到投资行为有扩大产品需求、缓和销售困难的作用，却忽视了投资行为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扩大生产从而扩大产品的供给和加剧销售困难（即美国经济学家多玛所说的“投资的二重性”）。照他说，只有按照他的经济增长模型行事，才能使经济持续地稳步地增长。

哈罗德的增长模型，则是一个由产量（收入）增长率（ G ）、储蓄率（ s ）、资本—产出率（ C ）等三个经济变量所组成的基本方程式（ $G = \frac{s}{C}$ ）。他通过这个经济增长模型表述了这么一个基本思想或基本结论：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乃是把产量（收入）的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恰好能吸收本期的全部储蓄的程度，归根到底，也就是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的观点。据此，哈罗德还进而提出三种增长率：（1）是实际进行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 G ），它是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 s ）和资本—产出率（ C ）来决定的。（2）是所谓“有保

证的增长率”(G_w)，据说这是这么一种增长率，即它所造就的经济活动水平能使资本家感到满意。具体说，它是在“实际储蓄率(s)等于人们合意的储蓄率(s_d)，实际资本-产出率(C)等于人们所需要的资本-产出率(C_r)的情形下出现的那个增长率。其方程式是 $G_w = \frac{s_d}{C_r}$ 。(3)是所谓“自然增长率”(G_n)，据说这是在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改进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其方程式是 $G_n = \frac{s_o}{C_r}$ ，其中 s_o 代表在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适宜的储蓄率。据此，哈罗德一方面把 $G = G_w = G_n$ 说成是最理想的均衡增长线，认为这既能实现“充分就业”和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又能避免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他又把这三种增长率之背离($G \neq G_w \neq G_n$)，说成是破坏均衡增长条件、造成“短期”或“长期”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照他说，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由于难以自动达到 $G = G_w = G_n$ 的理想境地，因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或危机无法避免。

哈罗德的上述理论和模型，既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同时也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和模型。他既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据此提出“医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痼疾的“药方”。但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和模型，都有其根本性的错误或缺陷。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本来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就是说，既取决于这些因素(或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也取决于它们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性质。哈罗德的理论和模型的根本缺陷之一，则不仅在于它只是着重于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少数几个经

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还在于他完全撇开了决定这一过程的本质和社会经济关系。尽管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尽管哈罗德关于投资与产量（收入）之间的“乘数”、“加速数”作用的数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某些技术特点，然而，决定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本质的，首先是支配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哈罗德的理论和模型，却撇开了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经济之波动，仅只归之于少数几个经济变量在数量上是否协调；结果，在他的模型中只存在几个变量的冲突，却看不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冲突。甚至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哈罗德的理论和模型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不真实的”。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早就尖锐地指出，哈罗德模型所描绘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利益的冲突……”。^①

第二，哈罗德的增长理论和模型的另一大缺陷，乃是它确立在凯恩斯所鼓吹的一些基本心理因素（如“资本边际效率”等）的作用上。且以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为例。按照他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若要长期保持充分就业，就必须使实际增长率（ G ）提高到劳动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要求的“自然增长率”（ G_n ）的水平，即（ $G=G_n$ ）；而要做到这一点，

① 罗宾逊：《哈罗德的动态经济理论》，刊《经济学杂志》1949年3月号，第69页。

就必须取决于资本家肯进行投资，于是关键就是要使这种“自然增长率”能够成为资本家所满意的增长率（即“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也就是：把资本家对投资需求的“预期”和对利润率的“预期”，保持在足够的水平上，实现 $G = G_w$ 和 $G_w = G_n$ 。可见，哈罗德的这个“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家的“预期”这个主观心理因素的基础上；而他在自己的体系中将“有保证的增长率”置于突出的地位，无非是想把资本家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渲染为支配经济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哈罗德的数量分析的“王国”，实际上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第三，还必须指出，哈罗德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和危机不可避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 $G = G_w = G_n$ 的动态均衡，但是，他和凯恩斯一样，其所以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必然性，只是为了否定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和传统政策，宣扬“国家调节”并为之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抗社会主义。他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宣称只要依据他的增长理论和模型行事，运用“国家调节”这一武器，“我们便毋须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长期地稳定地发展下去。

从他1948年发表《动态经济学导论》以后的20多年来，尽管他的理论和模型在西方经济学家中间为一些人所推崇，但它本身毕竟缺陷累累，因而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致哈罗德不得不对它进行一些“修补”。在1973年出版的《动态经济学》一书中，他从理论和政策主张两个方面进行了“修

补”。

(二)

长期以来，哈罗德的理论和模型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最多批评和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均衡增长线的存在问题；二、所谓“不稳定原理”问题。

如前所述，按照哈罗德的看法，三种增长率相等 ($G = G_w = G_n$)，标志着一种既能实现资本家的“预期”利润，又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理想境地，也代表着一条均衡增长线。但西方经济学界不少人对于哈罗德的这条均衡增长线是否存在，提出了质疑和争议。他们认为，按照哈罗德的看法，这三种增长率是各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因而实现这条均衡增长线极其困难，除非是一种“侥幸的偶合”。^①特别是由于充分就业须靠资本家的投资支出来实现，因而这条所谓均衡增长线能否实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否与“自然增长率”相等。而按照哈罗德的公式 $G_w = \frac{s_d}{C_r}$ ，其中 s_d 和 C_r 都是既定的，因而 G_w 只有唯一的一个值与 $\frac{s_d}{C_r}$ 相等。这种情况更使得 G 、 G_w 、 G_n 三者的相等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还批评说，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G_w)使经济增长率仅与 s 、 C 等变量相联系，从而抹煞了其他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特别是象罗宾逊夫人、克列格尔等凯恩斯主义者，也尖锐地批评他把经济增长途径看得象“刃锋”

① 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论》，1975年版，第49页。

(Knife-edge) 那么狭窄。他们批评哈罗德的体系中“有一个重大漏洞”，那就是由于缺乏分配理论而“从未考虑过利润率”。^① 因为照他们说，利润率对 s 和 C 都有影响，因而与不同的利润率相对应的可能的增长率必定“有一系列，而决不只有一个”。^② “把可以维持住的增长率的数目仅仅限于独一无二的‘刃锋’率，是没有道理的”。^③ “‘刃锋’问题，就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值能与 s 和 C 相匹配的问题”。^④ 而这个问题，自然直接关系着所谓均衡增长线 ($G = G_w = G_n$) 的存在问题。

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一书，在这个问题上较过去有所“修订”或“补充”。第一，他承认，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不只一个，而是多个。他把它们区分为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旧定义中的那个与均衡增长相联系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他称之为“正常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而其余的则称之为“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用 G_{ws} 表示之。他还强调“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跟“正常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不同，即前者并不代表一种均衡位置。例如，“在衰退的下限上，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将和实际增长率等值”，但“这根本不是一种均衡位置，甚至连不稳定的均衡位置也不是”。第二，他进一步考虑了利润率对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影响。本来，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利润率的“预期”上的。在《动态经济学》一书

① 克列格尔：《利润率、分配与增长》，1971年版，第115页。

② 罗宾逊：《二十一年后的哈罗德》，刊《经济学杂志》1970年9月号，第732页。

③ 克列格尔：《利润率、分配与增长》，1971年版，第117页。

④ 罗宾逊：《经济学异端》，1971年版，第111页。

中则进一步承认了利润率的变化对于资本家的“预期”，从而对于“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影响，明确提出“在景气或不景气的影响下有保证的增长率本身发生变化”，提出在不同的实际增长率下各有相应的“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总之，从哈罗德的上述修订和补充，多少可以看出哈罗德对于以罗宾逊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意见已有所考虑。

第二，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一书，还就“不稳定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所谓关于“有保证的增长率”的“不稳定原理”，一向是哈罗德借以鼓吹“国家调节”的思想工具之一，用它来宣传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达到和保持均衡。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有保证的增长率”(G_w)的不稳定性问题，跟前面所述“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唯一值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据说，所谓 G_w 的唯一值问题所牵涉的，是增长线($G=G_w=G_n$)的存在的问题；而 G_w 的“不稳定性”问题所牵涉的，则是 G_w 经常偏离均衡位置的问题，以及这种“不稳定性”的表现形式问题。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更经常用“刃锋”一词，来形容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的“不稳定性”，说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其量不过是“在均衡增长的‘刃锋’上才达到平衡”。^①然而，哈罗德反对用“刃锋”一词来形容 G_w 的“不稳定性”，认为那是歪曲了他的不稳定原理。照他的说法，不仅动态均衡不是“刃锋”所形容的那种“时间过于短暂的东西”，而

①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刊《经济学季刊》1956年第70卷，转载森编：《增长经济学》，1970年版，第161—162页。

且“有保证的增长率”的“不稳定性”表现为“累积”的形式：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G_w)与“实际增长率”(G)发生了偏离，则这种偏离不仅不能自行纠正，而且会越来越大，也决不象“刃锋”一词所形容的只是容易从均衡位置上脱落而已。他认为，如果用陡坡上的球来比喻“有保证的增长率”(G_w)的“不稳定性”，倒很恰当，“要推动这球，也许得狠踢一脚，但一旦滚动了，它会比平地上用同样的力来踢它要滚得更远”，而且决不会自行滚回原处。哈罗德特别强调这种“不稳定性”的表现形式具有“累积”的特点。

至于为什么这种“不稳定性”的表现形式会具有累积的特点呢？按照哈罗德以及其他人的“解释”，是由于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G_w)与“实际增长率”(G)发生了偏离，市场却给投资者以一种和实际情况“相反的信号”，^①使投资者在主观上（对投资需求的预期）产生了“错觉”，从而导致错误的行动，使这种偏离朝同一方向进一步扩大。例如，当 $G > G_w$ 时，本来意味着实际投资过度；可是，市场给予的“信号”却相反，使得投资者主观上反倒感到生产资本缺乏($C < C_r$)而乐于进一步扩大投资，使 G 进一步大于 G_w ，以致酿成通货膨胀。反之，当 $G < G_w$ 时，本来意味着投资不足，需要资本家扩大投资，据说也由于市场的“相反的信号”，使投资者反倒主观上感觉投资似乎“过多”而“预期”投资需求会下降($C > G_r$)，竟削减投资，使得 G 进一步小于 G_w ，以致酿成萧条。这么一来，他们便把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下的盲目性，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和

① 森编：《增长经济学》，1970年版，第12页。

危机的必然性，归咎于所谓“不稳定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累积”形式，并最后归咎于主观心理因素（投资者的“预期”错误）作祟。

总之，哈罗德的增长理论和模型是有严重错误和缺陷的。但应指出的是，其主要错误，还不在于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那些枝节方面，即不在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是否只有唯一值方面，也不在于所谓“不稳定性”的表现形式方面，而在于：他把全部理论和模型建立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错误基础上，用对主观心理因素的渲染和对单纯数量关系的分析，取代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的分析，从而窒息了揭示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及其根源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就某些枝节问题作了“补充”，却都无助于补救其理论和模型的这一根本性错误和缺陷。

或许有人会问，是不是哈罗德的经济模型毫无可取之处呢？我认为，如果仅就其基本方程式及其所表述的数量关系而言（即把再生产过程的社会经济形态暂置勿论），它对于我们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过程的某些问题，甚至对于我们研究已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某些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例如，一、可用于对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行初步估算或计划。如果把哈罗德的基本方程式 $G = \frac{s}{C}$ 从“有效需求”理论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则 s 实际是代表生产基金积累率（即投资 I 占国民收入 Y 中的比例），而 C 代表资金系数（即增加收入或产量 ΔY 所需配备的投资额 I ）。这样，我们便可以利用生产基金积累率和投资系数之比，

来初步估算或计划国民收入增长速率，即 $\frac{s}{C} = \frac{I}{Y} / \frac{I}{\Delta Y} = I/Y \times \frac{\Delta Y}{I} = \frac{\Delta Y}{Y} = G$ (增长速率)。二、这个基本方程式还有助于我们分析经济增长的某些条件或途径。其一，从方程式可以看出，增长率(G)是与生产基金积累率 (I/Y) 成正比例的，就是说，生产基金积累率愈高，则增长率便愈快。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考虑一下，生产基金的积累，无疑是来自国民收入中未被人们消费的部分，即可说是来自人们的“储蓄”部分。但人们的这个“储蓄”中除一部分转化为非生产性积累外，其余部分是否能转化为生产基金的“积累”，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品种、规格是否对路，取决于部门之间或部门内部的结构和比例是否合适；否则，这个“储蓄”部分只会成为仓库中的积压而不会成为生产中的“积累”，势必有害于增长速度的提高。其二，从方程式还可以看出，增长率(G)与投资系数 (C 或 $\frac{I}{\Delta Y}$) 成反比例，而投资系数 ($\frac{I}{\Delta Y}$) 的倒数 ($\frac{\Delta Y}{I}$) 却代表投资效果 (即每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或产量)，故增长率(G)与投资效果 ($\frac{\Delta Y}{I}$) 成正比例。这意味着：投资效果愈大愈快，则经济增长速度便愈大；反之，若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或其他原因，致使单位收入或产量占用投资基金增大，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

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一书，除了对他过去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进行修订和补充之外，还针对战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修补，特别

是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战略进行辩护。

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的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主张借“国家调节”来实行“需求管理”，用“膨胀性”经济政策来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特别是，按照哈罗德的所谓“长期的”、“动态的”分析，这种“需求管理”还必须实现技术进步和劳动人口增长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就使哈罗德的体系在国内基本经济战略上，更具有有一种“扩张主义”的内在倾向。但是，这种以所谓“实现充分就业”为基本政策目标、用“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用“通货膨胀”）作为“反危机”的主要武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战后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不满。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由于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发的严重局面，越来越多的人指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提出“头号人物”已不是“失业”而是“通货膨胀”，强烈主张摒弃这一“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战略。这种形势，迫使哈罗德挺身而出，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大声疾呼“失业”是一种比通货膨胀“更大的祸害”，坚持要以“避免”失业作为基本政策目标，并且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手法来公开为“扩张主义”经济战略辩护。

一是宣扬“扩张主义”国内经济战略“无辜”。哈罗德和其他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一样，不仅把通货膨胀区分为所谓“需求拉动型”与“成本（工资）推进型”等两种类型，而且把战后通货膨胀主要归结为“成本（工资）推进型”；宣扬只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应由造成“过度需求”的“扩张主义”经济战略负

责，而“成本(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则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于工会的“垄断”，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工资刚性”等等因素引起工资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它与“扩张主义”的经济战略无干。因此，医治的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即“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的进程进行干预”。

二是宣扬“扩张主义”的经济战略不仅“无辜”，而且还是“克服”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他提出所谓“哈罗德的二分法”，即把国民经济分成两大类：所谓“报酬递减”部门(如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和所谓“报酬递增”部门(如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他提出，如果货物和劳动的生产总的说来是受报酬递增规律所制约的话，则任何紧缩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势必迫使企业主由于缩减产量而增加成本，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反之，倒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却会使得他们能够降低价格”。

上述论调显然是错误的。首先，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一样，都是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凯恩斯主义者侈谈什么“需求拉动型”或“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其目的是，一方面以此掩盖战后通货膨胀的根源和实质，另一方面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推行“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战略辩护。第二，把通货膨胀所必然带来的物价上涨归咎于什么“工资成本”增长，则更加错误。据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三个经济扩张时期，美国的工资总额分别提高17.6%、18.1%和18.0%，而各时期的利润总额却分别增长17.4%、49.1%和21.6%，结果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份额增长了。^①一些美、英经济学家在事实面前也承认，物价之上涨，与其说是“工资推力”造成的，不如说是“利润推力”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垄断组织实施“操纵价格”的结果。最后，至于说哈罗德利用他的“二分法”，宣扬推行“扩张主义”可以促使“报酬递增规律”所制约的生产部门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也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其一，战后通货膨胀不同于一般的通货膨胀，它总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业，特别是自六十年代末以来，更是一种特殊的通货膨胀，即所谓“停滞膨胀”，一种在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严重失业条件下发生的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扩大物质生产不仅不能缓和通货膨胀，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使销售危机更趋尖锐。其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的对抗性，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调节”，都决不可能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充其量只能缓和或推迟危机。然而战后的历史表明，这种“扩张主义”经济战略从来都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公债的激增和信用的膨胀等，一句话，意味着通货膨胀。鼓吹用这种“扩张主义”战略来“消除”通货膨胀，岂不更是火上浇油吗？

哈罗德的增长理论和模型，本来是确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上面的。但由于六、七十年代国际经济风云之变幻，使得哈罗德在书中也依据自己的理论和模型，进而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如外贸、对外投资、国际收支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政策主张。值得指出的是，他强调一切对外经济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战略，指出“不应为了诸如通货膨

① 〔美〕《每月评论》1976年3月号。